

第一章 奇萊地區的自然環境與原住民族群

「奇萊」是臺灣後山極為富庶與重要的區域，自古以來即有豐富的族群互動與產金傳聞。各個先來後到的原住民族群，及「大航海時代」之後進入的國家力量，都想爭奪與控制這塊區域。

到底「奇萊」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它有何特殊的風土？在國家力量進入統治之前，又有著哪些族群在這裡活動？本章即試著從歷來的文獻、研究與傳說加以探討，以使得這個地區的自然環境，與在其間活動人們的相貌呈現出來。

第一節 「奇萊」的界定與自然環境

一、「奇萊」的界定

關於「奇萊」範圍的界定，過去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比較狹義的是指今天花蓮市一帶，即過去撒基拉雅族（沙奇萊亞族、奇萊族，Sakiraya 或 Sakizaya）分佈的範圍。在安倍明義的《臺灣地名研究》一書中提到：「舊時奇萊又書寫成岐萊，奇萊乃與阿美族的地名 Okirai 相近的音譯字。西班牙人所記的 Saquiraya 與 Okirai 相當。……」¹其實，奇萊的地名與撒基拉雅族有關，因早期接觸到這個族群的外來勢力誤以為是地名，而將它記了下來；到了撒基拉雅族勢力瓦解，移入阿美族部落成為阿美族的一部分之後，又被認為是阿美族的地名。

在清嘉慶 17 年（1812），來自噶瑪蘭的漢人李享、莊找，以布疋折銀 5250 大元向荳蘭等五社通事購買土地開墾，其位置是東至海，西至山，南至覓厘蕃溪，北至荳蘭溪，土名稱作「祈來」（即奇萊）的地方，²也就是指今天荳溪以北，七腳川溪（吉安溪）以南之地。這個範圍，顯然地已超過今天花蓮市的範圍，包括吉安鄉與壽豐鄉的一部分。到了道光 7 年（1827）5 月，吳全從諸社購得北起得其黎（今新城鄉立霧河流域），南至大鼻（即大笨、Duabun、美崙鼻），稱為「奇萊上港」之地，並且招募佃人墾殖，³其範圍則從今天花蓮市的北邊到立霧溪畔。

¹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頁 308。

² 曾一平，〈漢人在奇萊開墾〉，《花蓮文獻》1 期（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53），頁 77-79。

³ 黃瑞祥，〈花蓮縣居民繁殖考〉，《花蓮文獻》4 期（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55），頁 93；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稿》，卷 3（上），〈民族〉（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59），頁 8。

到了「開山撫番」之後，丁日昌於光緒 3 年（1877）所上的〈籌商大員移紮臺灣後山疏〉中提到：「自新城起至大巴隴止，約一百里，是為北路之歧萊。……」明顯地，其所指稱的奇萊範圍，往南延伸到今光復鄉的太巴塢（富田地區），⁴範圍更廣。

清治末期（光緒 16 年，1890），馬偕牧師曾造訪加禮宛及南勢阿美族的部落，提到：「奇萊平原，在臺灣東海岸的南部，是大約 4000 原住民的家鄉。……奇萊平原南北長約 30 哩，在山和海之間寬約 6 哩……。」⁵雖然沒有明確地說明範圍的大小，但是它超過今天花蓮市的範圍，是可以確信的。

到了日治初期，不少日本學者與官員親自履勘奇萊地區，其中，伊能嘉矩將奇萊的北限定在「北新城」（即今新城鄉新城村）⁶；田代安定則比較明確地界定「奇萊，乃位於花蓮溪（木瓜溪）以北到新城庄間的地名，而吳全城亦屬於奇萊的範圍。」⁷另外，日治初期宜蘭支廳書記官廣瀨充藏於明治 29 年（1896）7 月奉民政局長水野遵之命，前往花蓮港調查時，花蓮港總理陳得義告知，所謂「奇萊」即是「東到海，西至木瓜山，南至吳全城（即吳全城），北至新城庄」的範圍。⁸

本文在論述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歷史變遷時，所指稱的空間範圍，是採用日本學者及官員廣義、較常使用的奇萊來界定，也就是「北起新城，南到吳全城，東到海，西到山」的這塊區域。由於族群互動的頻繁，因此也會將鄰近的區域一併加以探討，以使研究空間的整體性不致被分割。

奇萊地區是後山非常富庶及重要的區域，在羅大春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中提到：「……得其黎以南六十里，則皆平地，背山面海。如悉墾種，無非良田……論他日建城之地，宜在歧萊（今花蓮市）。若新城、三層、馬鄰、鯉浪，不過營汛之區……。」⁹吳贊誠也在奏稿中提到：「……至吳全城溪流漸平，始有可開水田之處。由此北抵新城鵲子鋪（今新城鄉康樂村一帶）六十里內，平原沃壤，最

⁴ 丁日昌，〈籌商大員移紮臺灣後山疏〉，收入《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全），臺灣文獻叢刊第 28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頁 87。

⁵ 周學普譯，G.L. MacKay 著，《臺灣六記》，臺灣研究叢刊第 6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101。

⁶ 楊南郡譯註，伊能嘉矩原著，《臺灣踏查日記》上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322。

⁷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900。本文參考者乃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頁 27。

⁸ 廣瀨充藏，〈花蓮港地方狀況報告〉，《公文類纂》追加一卷ノ一七，內庶第三一七號，收於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臺灣史料稿本》，明治二十九年本（臺北：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頁 119-120。

⁹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30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 47。

為膏腴……。」¹⁰而胡傳的《臺東州采訪冊》，也說花蓮港以北至加禮宛各社，「二十里之間，最為平廣，土之膏腴甲於後山」。¹¹因此，早期漢人進入後山北部之後，往往選擇這裡作為主要的拓墾區域，而原住民族群也常常爭奪此地。

二、奇萊地區的自然環境

奇萊地區的東方，面臨浩瀚的太平洋；東南一隅隔著花蓮溪，可以見到海岸山脈的北端；而從西側綿延至北邊，則是高聳、險峻的中央山脈，使之與噶瑪蘭地區、西部臺灣分隔開來。由於北邊的中央山脈緊鄰太平洋，形成驚險的崖岸（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清水斷崖），加上山地分佈著強悍的泰雅族（Atayal）南澳番（分佈在今宜蘭縣南澳鄉）與太魯閣族，因此，在清帝國「開山撫番」之前，若要經由陸路到奇萊地區開墾或貿易，除非有熟識、友好的「生番」帶引，否則會有被獵頭的危險。

本區主要的平原有兩個，即花蓮海岸平原與立霧溪三角洲平原（即「得其黎三角洲平原」），兩者又可合稱為「奇萊平原」。花蓮海岸平原位於三棧溪口到木瓜溪下游之間，北接立霧溪三角洲平原，南連花東縱谷平原，西鄰加禮宛山、吉安山東麓，南北長約 19 公里，東西最寬 9 公里，幅員 90 多平方公里，外型類似一個弓形三角洲。¹²立霧溪三角洲平原則位於立霧溪口一帶，南北長約 8 公里，東西寬度在北端是 200-300 公尺，南端約 1 公里，中段則是 2 至 3 公里，幅員 15 平方公里左右。立霧溪河口的網狀流路，形成小型沖積扇，並將平原截斷，¹³在北邊有崇德村（屬於秀林鄉），南邊有富世村、秀林村（屬於秀林鄉）、新城村、順安村（屬於新城鄉）等聚落。

本區的溪流皆短而湍急，毫無航運價值，因此，都被稱為「溪」。¹⁴在昔日常因暴雨及颱風過境，造成洪水氾濫，釀成巨禍，且常阻礙人獸通行，造成不便。從北到南，主要的溪流有立霧溪、三棧溪、美崙溪、七腳川溪與木瓜溪。

立霧溪在日治以前稱為「得其黎溪」，是著名的砂金產地。其發源於中央尖山及畢祿山等山，匯集塔次基里溪、托寶閣溪（托博閣溪）、慈恩溪（魯翁溪）、哇黑爾溪、塔烏賽溪（陶賽溪）、沙卡當溪……等溪流之後，¹⁵經太魯閣（今秀

¹⁰ 吳贊誠，〈番眾悔罪自投現辦撫緝並撤裁營勇摺〉，收於《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23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 25-26。

¹¹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8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5。

¹² 林朝棨，《臺灣省通志稿》，卷 1，《土地志·地理篇》第 1 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頁 334；苗允豐，《花蓮縣志》，卷 4，〈地形〉（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2001），頁 95。

¹³ 苗允豐，《花蓮縣志》，卷 4，〈地形〉，頁 95。

¹⁴ 陳正祥，《臺灣地誌》，下冊（臺北：南天書局，1993），頁 1201。

¹⁵ 苗允豐，《花蓮縣志》，卷 4，〈地形〉，頁 115-116；韓耀隆，《續修花蓮縣志》，卷 3，〈氣候·地質·土壤〉（花蓮：花蓮縣政府，2000），頁 239-240。

林鄉富世村) 在新城村的北邊直入太平洋。

三棧溪發源於巴托魯山東麓，集水之後向東南邊流出，中游匯集七腳川山(慈雲山) 東麓細流之後折往東北，接著在距河口 2.5 公里處，匯集塔山南麓細流後轉向東邊，流經立霧溪三角洲南端，在順安村附近入海。¹⁶在今日，此溪與木瓜溪為後山重要的玫瑰石產地。

美崙溪舊稱「娑婆礁溪」，發源於七腳川山東麓，集水之後趨向東南，於秀林鄉水源村出谷進入平原，因河床變寬而形成沖積扇，並呈現出網狀流路。至花蓮市國慶里，美崙溪分歧為二：本流流向東北，於美崙山西麓北端匯集發源於加禮宛山東麓的樹林溪（又稱「須美基溪」）後折往南；支流則仍依原方向，經美崙山西麓南端與本流匯合，環繞花蓮市國慶、國福、國強等里，穿越花蓮市區之後流進太平洋。¹⁷

七腳川溪（亦稱為「吉安溪」）發源於吉安山東麓，集水後東流，於吉安鄉太昌村附近進入平原，至吉安鄉慶豐村後微向東南，¹⁸經吉安鄉永安、勝安、宜昌、仁里、東昌等村之後，注入太平洋。七腳川溪的中、下游部分，是南勢阿美與撒基拉雅族勢力範圍的分界線，據說以前常因河川的捕魚權而發生爭鬥。

木瓜溪發源於能高山東麓，集水之後趨往東南，匯集諸支流後，至秀林鄉銅門村出谷進入平原。銅門以東河床變寬，成為大的沖積扇、網狀流路，至壽豐鄉志學村後匯入花蓮溪¹⁹（之後花蓮溪繞過吉安鄉光華村、仁安村，流入太平洋）。木瓜溪的主要支流，為巴都蘭溪、巴托魯溪、清水溪；小的支流有柴田溪、丸田溪等。

而在花蓮海岸平原花蓮市的東側，有一海拔 108 公尺的小山丘，其舊稱有鰲魚山、八利科山、八螺山、米崙山等，²⁰民國 40 年（1951）改稱為「美崙山」。其脊嶺為南北走向，南麓緩降於美崙溪畔，北麓迄於花蓮海岸平原，東斜面毗連美崙台地，西側向美崙溪緩斜過去，接壤於花蓮海岸平原。²¹由於其地理位置及高度適當，使之成為花蓮地區的軍事要地，自清治時期開始即有軍隊駐紮於此；二次大戰時，日軍亦在美崙山下修築碉堡、地道等設施；而今國軍也駐紮於此，山上仍可見到不少軍事碉堡。

另外，在今花蓮市區有兩個小的台地，即美崙台地與花崗山台地。美崙台地

¹⁶ 苗允豐，《花蓮縣志》，卷 4，〈地形〉，頁 116。

¹⁷ 苗允豐，《花蓮縣志》，卷 4，〈地形〉，頁 117。

¹⁸ 苗允豐，《花蓮縣志》，卷 4，〈地形〉，頁 117。

¹⁹ 苗允豐，《花蓮縣志》，卷 4，〈地形〉，頁 102。

²⁰ 八利科山、八螺山的稱呼，顯然來自於平原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撒基拉雅人稱此山為 *Bazik*、*Bazek* (或 *Pazek*)，阿美族人稱為 *Barik* (或 *Parik*)，指的是一種小魚（鬼頭刀）。花蓮海岸平原中間，美崙山一枝獨秀，像是一隻魚從水中跳出，因而得名。

²¹ 苗允豐，《花蓮縣志》，卷 4，〈地形〉，頁 58。

位於美崙溪河口左岸、花蓮海岸平原中段的東緣，向東突出成爲美崙鼻，南以高約 10 公尺的台地崖臨溪，與花崗山台地相對；北部海拔 48 公尺（即四八高地），以 20 公尺台地崖急降，毗連花蓮海岸平原。東以海蝕崖臨海，崖高 15 至 35 公尺不等，其斜面分向西、南緩降。其西部毗連美崙山東麓，高約 50 公尺，並向東緩斜，以 15 公尺海蝕崖臨海；向北緩斜，與北部之南、西兩斜面環連，形成昔日的大笨湖（Duabun，原位於華東路附近，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即興建於此）。花崗山台地，則位於美崙溪河口右岸、花蓮海岸平原中段的東緣，海拔 20 公尺，呈橢圓形、南北走向。北以台地崖臨溪，與美崙台地相對；東、西、南三面，以緩坡與花蓮市區相接。²²

奇萊地區的海岸雖多爲岩岸，但因略呈平直，以致並無良好的港灣，使得船隻難於停泊。²³ 早期到奇萊地區的船隻，小艘的可以從美崙溪口（鯉浪港）逆流而上，當時美崙溪的流量比較大，只要颳著南風，帆船就可以順利駛進溪內，直接到達接近十六股的農兵（今花蓮市國強里）；而風力不夠時，就靠牛隻來拉船，或以人力來拉繃；²⁴ 大的船隻則必須停泊在今吉安鄉的南埔海邊、花蓮溪入海處的北方，再由小船接駁，或請阿美族人幫忙搬運。直到日治時期花蓮港築港之後，才解決船運及交通的問題。²⁵

²² 苗允豐，《花蓮縣志》，卷 4，〈地形〉，頁 87。

²³ 陳榮波，〈清季臺灣東部之農耕形態〉，載於《臺灣經濟史九集》，臺灣研究叢刊第 7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117；孟祥瀚，〈清代臺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興大歷史學報》創刊號（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1991），頁 134。

²⁴ 《淡水廳志》卷 16 提到：「臺北山後爲噶瑪蘭，向屬淡界，嘉慶十四年始開關。由噶而南邊境即蘇澳。又二十里爲大南澳，再七十里爲奇萊。陸路未關，由海道一日可到。港口（即今美崙溪）頗狹，僅容四、五百擔小船。入口後，水極陡，每年春三、四等月，乘風入口，各熟番牽舟競進。每番給予鹽一、二甌，歡極而去，陸續挾鹿茸獸皮各貨來，換布疋等物。該處寬廣與噶瑪蘭等，亦有中國人。……又聞之出口後，水程半日，復有水口（即秀姑巒溪），稍寬廣可停泊者，爲繡孤鸞（今豐濱鄉港口村）。土地膏腴，比之噶瑪蘭，寬廣一、二倍……」（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456-457）。而筆者於 2001 年 8 月 30 日在十六股地區進行訪查時，也聽當地耆老詹燕清說過類似的故事：「當時與臺灣北部的交通，主要靠海運，因爲走蘇花間的小徑非常累，山路狹小又不熟悉，加上番人又會襲擊，很多漢人還來不及到奇萊就被殺死了；利用帆船運輸則非常方便，除非東北季風太大，否則都能往來。以前美崙溪流量很大，只要是颳著南風，帆船就可以順利駛進溪流，直接到達接近十六股的地方（農兵）；而風力不夠時，就靠牛隻來拉船，或以人力來拉。當時的原住民很喜歡拉繃，只要他們去拖船，就用杓子裝兩、三杓，大約三、四斤的鹽給他們。鹽對漢人而言很便宜，但原住民不會製鹽，因而非常喜歡。」（潘繼道，〈花蓮舊地名探源—被遺忘的「十六股」軼事〉，《歷史月刊》171 期（臺北：歷史智庫出版有限公司，2002），頁 7）。

²⁵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曾指定花蓮溪口至美崙溪口長約 4 公里的弓形海岸，作爲輪舶寄泊地，但由於物資輸出入量數量漸增，且港口灘寬水淺，船隻往往必須停泊於數公里外，再以小船及人力接駁貨物。尤其冬季氣候惡劣，浪高潮險，人、物皆危，所以築港之聲浪不絕。經前後任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郎與猪股松之助等人屢次建議，及陸上聯外交通改善，臺灣總督府終於在昭和 5 年（1930）通過花蓮港築港案，並於昭和 14 年（1939）10 月 2 日竣工（張家菁，《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120-125）。

總之，中央山脈的高聳矗立，使得由臺灣東北部與西部進入奇萊地區的交通受阻；而短小湍急的河川，常因暴雨及颱風過境造成災害，且常阻礙人獸通行，造成不便；海岸線又缺乏良好港灣，使得船隻難於停泊；加上這裡常有地震，其不可預知及無季節性的突發狀況，更是嚴重的威脅。這些自然環境給早期奇萊地區的開拓帶來阻礙。

另外，人文的因素更是早期漢人及其他外來族群進入奇萊地區移墾的重大阻礙，因為這些移入者常須面對本區原住民族群強大的抵抗與襲擊。

第二節 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

後山自古以來，即是個多族群分佈的區域，但不管是原住民族或是漢人，都不是真正的「原住」族群，而是在不同時期因不同需要，從各地逐漸移入後山的。近年來由於原住民族意識的抬頭，因此將漢人移入之前即分佈在臺灣地區的族群稱為「原住民」族群。在清代，奇萊及其周遭地區分佈的原住民族群，大致有撒基拉雅族、太魯閣族、噶瑪蘭族與南勢阿美族。以下即敘述其分佈與概況，以便瞭解「開山撫番」之前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原有的景況。

一、撒基拉雅族（Sakiraya）

撒基拉雅族（沙奇萊亞族、奇萊族）現已列為阿美族(Ami)南勢阿美的一個小群，²⁶然而在筆者於 1991 年採訪撒基拉雅族後裔的李來旺校長所得的口述歷史資料，及其所使用的語言，明顯的與阿美族不同。²⁷李亦園也認為：「……飽干、歸化二社之前身為竹窩社 Takoboan，……Sakitsaja(即 Sakiraya)系統的語言與以上諸社(即荳蘭、薄薄、里漏、七腳川各社)的語言有顯著的差別，其差別的程度較南勢阿美之與恆春阿美的差別尤大……」。²⁸此族群與其後遷入的噶瑪蘭族關係密切。

撒基拉雅族在清代文獻中寫成「筠郎耶」及「巾老耶」。²⁹事實上，早在西班牙統治北臺灣時即出現 Saquiraya；而在荷蘭文獻上，也將它記錄為 Sakiraya、

²⁶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稿》，卷 3(上)，〈民族〉，頁 15。但也提到：「鄰近之七腳川群荳蘭薄薄群，則稱之為沙奇萊亞而歧視之，不與通，遂自成族稱……」。

²⁷ 請參閱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附錄中有關李來旺校長的訪談（頁 213-223）。

²⁸ 李亦園，〈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載其所著《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 147-148。

²⁹ 藍鼎元，〈紀臺灣山後崇爻八社〉，收於丁曰健，《治臺必告錄(全)》，臺灣文獻叢刊第 1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42：「……土番分族八社：曰筠郎椰……。」；吳贊誠，〈番眾悔罪自投現辦撫緝並撤裁營勇摺〉，頁 25。

Saccareya 或 Zacharija。花蓮早期的地名稱爲「奇萊」，即是因爲接觸到這個族群而得名。³⁰

在昭和 8 年（1933）馬淵東一的調查中，提到撒基拉雅人「自身與其他的 Pangtsah 族作區別時，在飽干社與舞鶴社稱爲 Sakizaya，歸化社稱爲 Sakidaya，而其他的 Pangtsah 族則稱他們爲 Sakiraya……。」³¹但從上述所提及大航海時代接觸到撒基拉雅族的西班牙人、荷蘭人的稱呼，及早期漢人對奇萊地名的發音看來，其發 R 的音，似乎比 Z 或 D 來得強，而且在馬淵東一調查的昭和時代，這些族社已長時間經過遷徙或與其他阿美族人雜居，語言上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因此，筆者在撒基拉雅族的族名拼音上，認爲 Sakiraya 應該比較接近原來的發音才是。

根據撒基拉雅族耆老的口述歷史，昔日的撒基拉雅族大致分成六個主要的部落，即 Dagubuwan(即竹窩宛、竹高滿、達固部灣，乃光緒 4 年（1878）結合噶瑪蘭族反抗清帝國的重要番社，原址在今花蓮市明廉國小到四維高中一帶)、Navaguwan(在今花蓮市舊市區、舊火車站一帶)、Chibaugan(即飽干，今花蓮市主權里德安一帶)、Damasaidan(今花蓮市北濱街一帶)、Duabun(即大笨，今花蓮港港口華東路一帶)與 Balik(或稱爲 Bazik，在美崙山麓花蓮高工一帶)。³²他們原本居住在奇萊平原的菁華區，南邊與南勢阿美相鄰，西邊、北邊跟太魯閣族的狩

³⁰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板橋：稻鄉出版社，1999），頁 32、44 及頁 88-89；駱香林，《花蓮縣志稿》，卷 3(上)，〈民族〉，頁 25。

³¹ 移川子之藏等著《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5），頁 504。

³² 請參閱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附錄中有關李來旺校長的訪談（頁 213-214）。而在陳俊男轉引李來旺校長在 1996 年 10 月 17 日在政大民族學系所作的演講中，其部落有十個，除筆者上述六個之外，還包括 Kenoy（唸成 Gnuei，今吉安鄉北昌國小一帶）、Civarvaran（唸成 Chivarvaran，今花蓮市國光商工以東）、Civawngan（唸成 Chivaergan，美崙工業區）、Cikep（唸成 Chikp，美崙高爾夫球場附近）（陳俊男，〈奇萊族（Sakizaya 人）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1999），頁 30）。然而，筆者訪問同屬撒基拉雅族後裔的黃金文時，他認爲有些地名只是以前老人家在外耕作時，爲了區別不同地方而遺留下的地名，並不是真有那麼多部落（參見潘繼道，同前，附錄，頁 251）。而在廖守臣的調查資料中，有不同的族社名稱出現，包括塔閣寶安（Takofan，居今花蓮市德興里，該族的本部落）、Sinsya（居今豐川，清時稱「十六股」）、Todo（居今四維中學稍西，清時稱三仙和）、Lifoh（居今國慶里，清時稱竹窩宛，其地多茄苳樹，又稱「沙可魯」）（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未出版，1985），頁 40）。然而在 2001 年編纂的《阿美族史篇》一書中，則將四個小社改爲四個氏族（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2001），頁 50）。不管如何，Dagubuwan 都是最重要的部落。由於該族社目前耆老多已凋零，而且傳說中往往雜有阿美族的影子在裡面，因此，不易得知其真實的面貌。筆者乃以之前的調查爲本，來敘述這個族群；如果將來有更新的證據出現，筆者將會參酌加以更正。另外，Barik 可能即是陳淑均《噶瑪蘭廳志》所記載的「罷鞭」（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頁 433），因爲在十六股地方耆老的傳說提到：「……彼等皆先後乘巨舶數拾，自淡水出發，經北太平洋，到奇萊拔便港（即今日花蓮市之美崙溪下游，自尙志橋以下，爲昔年奇萊對外海上交通之唯一要港）……」（《籌備重建花蓮市延平王廟（復興宮）特輯》（花蓮：花蓮市延平王廟管理委員會，1985），頁 3）。拔便即是「罷鞭」，當地人稱美崙山爲八螺仔山、八利山。

獵地毗連。道光 20 年(1840)，噶瑪蘭族陸續移入後山北部的鯉浪港（今美崙溪口）之後，侵犯到他們的勢力範圍，因而出兵將噶瑪蘭人擊退，使噶瑪蘭人不得不往北邊發展，而卜居在加禮宛（今新城鄉嘉里村）。

當時的加禮宛，位於撒基拉雅族與太魯閣族的緩衝區域內，有噶瑪蘭族在北邊，將可緩和撒基拉雅人跟太魯閣族直接的衝突；而且，之後噶瑪蘭族拓墾的區域，主要在今嘉里村附近的平原及須美基溪，並不侵擾撒基拉雅人的土地，加上從事水稻種植所需要的低濕地，與撒基拉雅人從事旱田燒墾粟作農業的土地不同；而雙方風俗、語彙相近，及近山地區太魯閣族人侵襲的壓力，使得兩族和睦相處，³³成爲攻守同盟。後來並曾共同出兵，打擊近山地區的太魯閣族群。³⁴另外，根據撒基拉雅族 Dagubuan 社的口傳歷史，以前其祖先曾跟部落後面山上的太魯閣族人發生衝突。最後以「奇特」的方式襲擊，³⁵迫使太魯閣族人遷社。

在鹿子木小五郎的《臺東廳管內視察復命書》中，曾提到：「……兩社相勾結，橫行於附近時，有時狩獵於古魯山（秀林村）、九宛山（景美村），或是在三棧、新城、得其黎（崇德村）一帶捕魚。與太魯閣人遭遇時，即將之殺戮，而太魯閣人無法抗拒，畏之如虎……。」³⁶後因「加禮宛社之役」戰敗，使得撒基拉雅族人流離四散，其中一部分留在原居住地（改稱「歸化社」），而大多數族人則向南竄入阿美族部落，與之通婚、雜居，或者建立馬立文社(Maivuru，今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加路蘭社(Karururan，今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村)。³⁷由於戰爭的挫敗，使其恐懼清帝國官軍的迫害，因而不敢說自己的族語，而改說阿美族話，遵從阿美族的習俗，漸漸地被阿美族同化。

³³ 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 118；潘繼道，〈花蓮舊地名探源—被遺忘的「奇萊」民族與其故事〉，《歷史月刊》127 期（臺北：歷史月刊雜誌社，1998），頁 7。另外，詹素娟從語言、類緣傳說關係上一加禮宛人與「哆囉滿地區」的歷史關係，試圖探討撒基拉雅人接受加禮宛的噶瑪蘭人的論述，有獨到的見解，值得參考（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 1900 年）〉（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頁 211-222）。

³⁴ 關於撒基拉雅與噶瑪蘭族人的互動，請參閱潘繼道，〈花蓮舊地名探源—認識加禮宛〉，《歷史月刊》134 期（臺北：歷史月刊雜誌社，1999），頁 82-84，及潘繼道，〈花蓮舊地名探源—被遺忘的「奇萊」民族與其故事〉，頁 7。

³⁵ 以前撒基拉雅族 Dagubuan 社後面的山上，曾居住著太魯閣族人，他們經常出草獵取撒基拉雅人的頭顱，然後掛在入社前的大樹上，向撒基拉雅人炫耀、示威。爲了解決這樣的威脅，據說撒基拉雅族中年長的人，邀請太魯閣族人到美崙溪的河床上進行談判，而部分族中的青年從阿美族人那裡知道有一種東西的黏性很好，因此，先把河床上的石頭抹上這種黏接物，使得到場參加談判的太魯閣族人的屁股黏在石頭上面，動彈不得，而被一一砍頭；其餘在社內的人得知消息後，恐懼地搬到了大山（Garusan，今佳山）（潘繼道，〈花蓮舊地名探源—被遺忘的「奇萊」民族與其故事〉，頁 7-8）。

³⁶ 鹿子木小五郎，《臺東廳管內視察復命書》（原手稿完成於日明治 45 年，1912。本文所參考者乃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頁 171。

³⁷ 駱香林，《花蓮縣志稿》，卷 3(上)，〈民族〉，頁 15。Maivuru 的發音與舞鶴的日語發音「まいつる」(Maitsuru)相近，因此，日治時期將之改成舞鶴。

二、太魯閣族 (Toroko)

東臺灣花蓮地區的太魯閣族，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被歸類為泰雅族 (Atayal) 賽德克亞族東賽德克群。³⁸而在民國 93 年 (2004) 1 月 14 日，經行政院會通過，正名為「太魯閣族」，正式成為臺灣第 12 個原住民族。

由於太魯閣族、泰雅族與賽夏族 (Saisiat) 分佈在臺灣島的北部山區，因此，在清代文獻上被稱為「北番」，³⁹而且由於他們有黥面 (現改稱「紋面」) 的習俗，因此，也常被稱為「黥面番」或「王字番」。⁴⁰

太魯閣族的祖先來自今南投縣仁愛鄉霧社以東 10 餘公里的托魯望 (Torowan) 一帶，因族人狩獵於中央山脈脊嶺，發現山脈東邊原野廣袤、水草肥美，因而率族人遷徙至後山北部的立霧溪 (即得其黎溪)、木瓜溪等流域。

根據其祖先的口傳歷史，距今約 300 多年前，因為原居住地狹小及狩獵的關係，太魯閣系統 (或稱托魯閣) 的族人從 Toroko-Torowan (今仁愛鄉靜觀村的西南方)、塔烏賽系統 (或稱斗史、托賽、斗截、陶賽) 的族人從 Tausa-Torowan (今仁愛鄉平靜村附近山區)、巴雷巴奧系統 (即木瓜番) 的族人從 Takelaya-Torowan (今仁愛鄉春陽村附近山區) 遷徙到後山北部。⁴¹

隨著子孫繁衍之後而分佈四方，因居住地區遼闊，逐漸形成五個部族：內太魯閣番 (居住在立霧溪上游者)、外太魯閣番 (居住在立霧溪及和平溪以南、娑婆礁溪以北山麓者)、巴都蘭番 (屬於太魯閣系統，當族人擴張到木瓜溪上源的巴都蘭溪後，與巴雷巴奧系統的族人發生衝突，最後甚至趕走巴雷巴奧人，成為當地的主人)、木瓜番 (當太魯閣系統族人來到後，因勢單力薄，而遷到木瓜溪以南木瓜山一帶，由於最初居住的區域是木瓜溪流域，因此，又被稱為「木瓜番」)

³⁸ 日治時期以來的學者，將泰雅族 (Atayal) 區分為泰雅亞族 (Atayal Proper) 與賽德克亞族 (Sedeq Proper)，此二亞族的分佈區域，大致可從今南投縣境的北港溪，至今花蓮、宜蘭兩縣交界的和平溪 (即大濁水溪) 畫一界線，以北的山區屬於泰雅亞族的散居地；以南的山區則為賽德克亞族的散居地。而且又常將賽德克亞族依其居住區域分類為二：即分佈在中央山脈以東者為東賽德克群，是指居住在花蓮縣境 (一部分後來遷徙到宜蘭縣境) 的一群；以西者則稱為西賽德克群，即分佈在南投縣境內的一群。

³⁹ 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臺北：南天書局，1988)，頁 9；鈴木作太郎，《臺灣の蕃族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8)，頁 2；及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上)〉，載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4 期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8)，頁 61。

⁴⁰ 孫得雄，〈臺灣山地之人口〉，載於《臺灣之山地經濟》，臺灣研究叢刊第 81 種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 1；丁紹儀，《東瀛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70 云：「噶瑪蘭廳……西南山內未化生番由東澳南接奇萊，社名均無可考；見其額刺『王』字，咸以王字番名之。」

⁴¹ 駱香林，《花蓮縣志稿》，卷 3(上)，〈民族〉，頁 18；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上)〉，頁 63-68。其中，廖守臣亦提到遷徙時間約在九、十代前 (一代 30 年計算的話，大致相符) (頁 68)。

與塔烏賽番（居住在塔烏賽溪與和平南河流域者）。⁴²由於太魯閣系統的族人，不但是東賽德克群的主要成員，也是全賽德克亞族當中（包括花蓮、南投兩縣賽德克人）總人口數最多的一群，加上其分佈廣，其他各系統的族人已受其影響；而在花蓮縣境內的塔烏賽與巴雷巴奧系統的族人與其長時間相處，因此，花蓮各地的東賽德克人已習慣稱自己為「太魯閣族」。⁴³

太魯閣族行山田燒墾與狩獵。其強悍的民族性造成附近族群莫大的威脅，對於侵入其領域的外來族群，更是加以痛擊，有時則因習俗及展現男子的英勇，而出草割取其他族群、番社的首級。由於外太魯閣番出擊無常，因此，使分佈在平面上的南勢阿美族的戰士隨時都在戒備中。⁴⁴

早在太魯閣族群進入立霧溪下游之前，立霧河流域有不少原住民族群存在。在荷蘭治臺時期，產金的傳說一直是荷蘭人對東臺灣非常感興趣的，並探知產金的地點在水蓮尾（Sivilien，今壽豐鄉水璉村一帶）、Linaw（或 Lijnau，今吉安鄉東昌村里漏部落）、Takijlis（今秀林鄉崇德村一帶）等地。1646年5月，商務員 Gabriel Happart 去雞籠、淡水時，曾招聚原住民通譯 Theodore、日本人 Jacinto 九左衛門、Lucas Kilas，以及多次去過噶瑪蘭（今宜蘭縣蘭陽平原）因而相當通曉當地情形和語言的 Wilhem Alberti 等人，聽取有關產金地的消息，當時即曾獲得情報：噶瑪蘭人稱金礦地為「哆囉滿」（Turboan 或 Tarraboan，與北部金包里社人同樣說著馬賽語），該地的住民有哆囉滿人、Pabanangh 人、Dadanghs 人。哆囉滿人與 Dadanghs 人每當天氣惡劣時，常年在立霧溪下游的岸邊採取砂金；而 Pabanangh 人則是一年之中有三個月，不但在立霧溪的下游採取砂金，也在上游採取許多較大粒的黃金。至於山中金礦的情形並不清楚，因為當地的原住民非常害怕遇到 Parrougearon 人（或稱為 Poulechron 人、Poulecheronder 人），不敢到深山中去採金（Parrougearon 人不准別人採金）。自噶瑪蘭地區到哆囉滿，因為 Parrougearon 人的兇蠻和斷崖的險阻而無法通行。⁴⁵

這裡的 Parrougearon 人，應該就是太魯閣族群，當時他們已經來到立霧溪上游的深山中。而在荷蘭人的傳說中，曾提到 Parrougearon 人額頭至鼻下刺青，面貌如同猿猴。1645年12月，荷蘭人 Caesar 率領隊員到哆囉滿時，提到在河流上

⁴² 駱香林，《花蓮縣志稿》，卷3(上)，〈民族〉，頁18-19；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上)〉，頁65-74。

⁴³ 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上)〉，頁88。

⁴⁴ 李亦園，〈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頁170。

⁴⁵ 許粵華譯，中村孝志著，〈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採金事業〉，收入《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板橋：稻鄉出版社，1997），頁208-230；許賢瑤譯，中村孝志著，〈荷蘭人的臺灣採金事業再論〉，收入《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235-239；許賢瑤譯，中村孝志著，〈荷蘭時代的採金事業補論—特別關於哆囉滿〉，收入《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253-254。

游於山中行走 7 小時行程之處，有強悍凶暴的 Sonkou 村 (Tsongao) 之存在。⁴⁶ 之後隨著太魯閣人擴張到立霧溪下游之後，Pabanangh 人、Dadanghs 人消失了蹤影，而哆囉滿人似乎在 18 世紀後半之後逃往了噶瑪蘭，投靠同樣說著馬賽語的親族，成為哆囉美遠社 (Torobiawan) 的一部分。⁴⁷

另外，根據馬淵東一所採集的口傳歷史，在太魯閣番與塔烏賽番遷徙到立霧溪流域之前，當地也曾居住著一群稱為 Mak-qaolin 的族群，隨著他們的到來，雙方發生土地爭奪戰，許多 Mak-qaolin 人遭到太魯閣族人獵首。為躲避災難，因而遷徙到花蓮港附近，或向北經過和平溪口、大南澳 (宜蘭縣蘇澳鎮南強、朝陽二里)、南方澳，最後逃到蘇澳鎮頂寮、龍德二里，成為噶瑪蘭三十六社中的「猴猴社」。⁴⁸ 而在廖守臣所採集有關獵首來源的傳說中，也提到立霧溪中、下游一帶溪谷曾住有 Skolien，⁴⁹ 而這應該就是指 Mak-qaolin 人。

而在太魯閣族群發展的過程中，也曾出現過一支勁敵，據說是阿美族的一支，太魯閣族人稱之為米亞灣人 (Miyawan)。他們至遲在 19 世紀初曾活躍於立霧溪附近到今和平一帶的海岸，使得太魯閣人必須遷社以防範，並監視米亞灣人的行動。最後在太魯閣族人的攻擊下，米亞灣人率眾南遷。⁵⁰ 立霧溪 (Takilis) 附近據說也曾居住有其他阿美族的部落，由於受到太魯閣族的壓迫，因而遷移到恆春等地方。⁵¹

而木瓜番被太魯閣系統的族人稱為 Pulevao (巴雷巴奧)，阿美族人則因其身手就像「猿猴」攀爬時一樣地敏捷，因而稱之為 Tsungao (即「崇爻」)⁵²。木瓜番遷徙到木瓜溪流域以後，就與居住於今天吉安鄉、壽豐鄉的阿美族人往來，他

⁴⁶ 許賢瑤譯，中村孝志著，〈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頁 238-239。

⁴⁷ 許賢瑤譯，中村孝志著，〈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特別關於哆囉滿〉，頁 256。

⁴⁸ 馬淵東一，〈研海地方に於ける先住民の話〉，收入《南方土俗》1 卷 3 號 (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南方土俗學會，1931)，頁 87-94。

⁴⁹ 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 (上)〉，頁 72。根據其採集的傳說，Skolien 為平地阿美族的一支，然而參照其發音及馬淵東一所採集的 Mak-qaolin 的遷徙傳說，Skolien 應該就是指 Mak-qaolin 族群。

⁵⁰ 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 (上)〉，頁 108、111-112、127-131、205。根據傳說，米亞灣人的祖先原居住於宜蘭，後遷徙到今新城鄉順安村稍南的地方，而活動的區域在新城到三棧之間的平原地區，他們經常從海岸登陸突襲今和平地區，使當地的太魯閣人不敢在海岸平原定居，而選擇山腹地帶建立部落；後來太魯閣人為表現其好猛兇狠，常下山襲擊並獵殺其頭顱，因而雙方爆發戰鬥，最後，米亞灣人被太魯閣人擊敗，而率眾南遷，有一部分住在七腳川山山麓 (今吉安鄉太昌村、慶豐村近山地區)；一部分則遷到了今鯉魚潭的西南山麓。

⁵¹ 移川子之藏等著，《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02、405、409、413、419、421、429、434、469、474、479、480、533。

⁵² 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の研究》，頁 94；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 308；駱香林，《花蓮縣志稿》，卷 1，〈疆域〉 (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57)，頁 20-21。「崇爻」原本指的是木瓜番，但漢人誤以為它是地名而記了下來。後來轉而成為奇萊平原，或是後山北部一帶的稱呼，甚至指稱的對象也從木瓜番轉成地上的阿美族 (包括撒基拉雅族)，因而在清代文獻上有所謂後山「崇爻八社」、「崇爻九社」的稱呼。

們一度成爲東部與西部物物交換的中間商，將東海岸的物資帶往埔里交易，並把中央山脈西邊的物產帶到後山來。⁵³這種行爲一直到巴都蘭番來了之後才終止。

在清嘉慶 8 年 (1803)，日本人文助因船隻故障，漂流到秀姑巒溪口，並在當地生活了四年多，在其見聞中提到：在當地嫁給漢人商家的婦人，平常利用貝類製作裝飾品，與秀姑巒溪上游、中央山脈一帶的布農族與木瓜番交易，並帶回他們的山產。其中，對於木瓜番方面，曾提到雙方有戰爭、馘首的事情發生，他就曾親自看到當地人在活捉木瓜番回來後，聚眾設宴，先將俘虜餵食兩、三天，然後切割首級及兩手、兩腳，一面高舉著在部落間巡迴遊行，一面則高呼「*チョーガワ、チョーガワ*」(崇爻、崇爻)。另外，他也提到當時秀姑巒溪口的部落有芝舞蘭 (*チョプラン*)、*Amisan* (*アミサン*)、*Chikasyuwan* (*チカシュワン*或*チカシュエワン*)。根據山中樵等的考證，*チカシュワン*按照發音來判斷，應該是七腳川，不過七腳川應該是在南勢阿美的聚落內，不應該出現在東海岸的聚落中，也許是文助聽錯或誤寫所致。而且從資料上與口語傳說中，也不曾聽說七腳川曾經遷徙到秀姑巒溪口岸一帶。⁵⁴筆者推斷，文助在當地居住了一段時間，可能聽過七腳川，而把它當作是附近的部落名稱。若再參照前面提到的，木瓜番曾經跟吉安鄉、壽豐鄉一帶的阿美族人物物交換，而木瓜番與南勢阿美七腳川社居住位置非常靠近，秀姑巒溪口的部落又與木瓜番之間有戰鬥的現象，也許七腳川就是在其戰爭期間雙方交惡的情況下，居中將物產、裝飾物，從東海岸帶到木瓜番的部落。

在南勢阿美族人居住的南方，是木瓜番活躍的區域，木瓜番就曾偷襲過秀姑巒阿美的馬太鞍社人 (今光復鄉大馬、大華村一帶)。有一次約有 500 名的馬太鞍社人挑蓮草到花蓮港一帶販賣，在回家的路上，先行部隊 200 人在今壽豐東南方的河邊上遭遇到 300 名木瓜番的襲擊，混戰多時後馬太鞍人 6 名死亡；而當木瓜番有 1 人被殺後，木瓜番才收兵歸去。⁵⁵另外，馬太鞍社的始祖傳說中提到從前有兄妹二人，和他們的家人一起住在 *Karara* (今瑞穗鄉舞鶴村)，哥哥的名字叫做 *Pilukalau*，妹妹的名字叫 *Marokirok*。有一天，海水突然來了，家人全被沖走，他們兄妹二人躲在木臼內，任海水漂流，而來到了 *Tsatsulaan* 居住了下來。後來，他們結爲夫婦，共生子女十二人 (六男六女)，並各自婚配。其中，*Taimo-vaovawan* (男)、*Save* (女) 是木瓜番的始祖；*Taimo-apolod* (男)、*Ipai*

⁵³ 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臺北：南天書局，1996)，頁 33、342；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布(上)〉，頁 65-74。

⁵⁴ 秦貞廉編輯，〈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 *チョプラン* 嶋之記〉，收入臺北帝大圖書館內臺灣愛書會編輯，《愛書》，第 12 輯 (臺北：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內臺灣愛書會，1940)，頁 15-16、26-27、46-47、57；山中樵，〈解說〉，收入臺北帝大圖書館內臺灣愛書會編輯，《愛書》，第 12 輯，頁 11。

⁵⁵ 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 8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5)，頁 251-252。

(女)是太魯閣番的始祖。⁵⁶把木瓜番等敵人認為是其子孫，乃出於一種言詞或心理上欲戰勝對手的想法，因而留下這樣的傳說吧！而這或許只是單純想解釋周遭族群的來源，也或許是萬物本於同源的想法吧！

在花東縱谷地區，除了馬太鞍社曾經遭到木瓜番襲擊之外，據說在今壽豐鄉、鳳林鎮北部原本也有阿美族人分佈，由於不堪木瓜番的攻擊而遷徙他處，⁵⁷此處即成為木瓜番的狩獵地。

另外，在海岸阿美族的口傳歷史中，也多次提到木瓜番到海岸山脈狩獵及出草，是彼等南遷的重要因素，使得自水蓮尾（今壽豐鄉水璉村）至丁仔漏（今豐濱鄉豐濱村）附近的海岸阿美族人，因遭受到襲擊，被迫放棄故居遷徙他處。⁵⁸

而太魯閣族群內部的戰爭，竟意外地促使南邊布農族的遷徙。當巴都蘭番擴張勢力來到木瓜溪上源及其支流巴都蘭溪之後，木瓜番屢屢遭到攻擊，而內部又發生內訌，削弱了力量，最後不得不輾轉遷移到馬里勿（Malibasi，今萬榮鄉萬榮村）、大觀（Takahan、塔卡杭、長漢，今萬榮鄉明利村）一帶，並將附近的布農族(Iwadan, Bunun)逼退到富源（屬於瑞穗鄉）、馬遠（屬於萬榮鄉）以南的區域。⁵⁹

隨著噶瑪蘭族及漢人陸續移入奇萊地區之後，由於鄰近其耕獵空間，容易發生衝突，甚至遭受出草的惡運。太魯閣族對清代漢人後山的開發，無疑地是一大阻礙，因而清政府在「開山撫番」之後，在北路地區興築營壘，以防禦其攻擊。

三、噶瑪蘭族(Kavalan)

根據馬淵東一採自花蓮新社（今豐濱鄉新社村）陳潘氏阿未那交，有關噶瑪蘭族祖先遷徙的傳說中提到：「以前 Sunasai 地方有一個叫做 Kazuzangan 的男人，他的妻子叫 Kunasayan，他們兩人是噶瑪蘭人的祖先。這兩夫婦生了 Tyabango-zaya、Takid-Zaya、Tironokadi 三個兒子。這三兄弟因為 Sunasai 地方土地狹小，且耕地不足，因此，商量想去別的地方，於是各作了一隻船，而船的名字分別叫做 Saranawan、Kurusayan、Kuravikav。他們三人一起從 Sunasai 出發。當時船板用籐綁著，而縫隙填塞上芭蕉葉、破竹，使得船隻不致漏水。不久，三人的船到達了 Takiris（立霧溪附近），但是因為耕地很少，因此，Tyabango-zaya

⁵⁶ 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頁 8。

⁵⁷ 移川子之藏等著，《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09、506。

⁵⁸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著，《臺灣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頁 179、188、194、202、233；移川子之藏等著，《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397、399、405、409-417、419-420、434、436、451、453、498、507、540。

⁵⁹ 移川子之藏等著，《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94-95；瓦歷斯·諾幹、余光弘著，《臺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頁 128-129。

跟 Tironokadi 就搬遷到宜蘭的平原，他們的子孫就是噶瑪蘭族；而 Takid-zaya 留在 Takiris 那裡，他的子孫就成了太魯閣（Taroko）番。至於 Sunasai 是南方的島嶼，但並不清楚它在那裡；南方有兩個島，也都是叫 Sunasai……」。⁶⁰其中，出現 Takiris 的地名及 Taroko 族群的稱呼，或許可以推斷其祖先在到達蘭陽平原之前，可能經過了立霧溪口（タツキリ，得其黎）而有所接觸，其中的 Takid-zaya 與木瓜番（Takelaya）的發音更是雷同；而認為太魯閣族群是其子孫，乃與前面所敘述的馬太鞍社始祖的傳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無法在現實的戰場上打敗勁敵，而改由精神上戰勝對手，也或許只是單純的萬物本於同源的不同版本吧！

噶瑪蘭族原本分佈於蘭陽平原上，隨著清嘉慶元年（1796）吳沙等漢人入墾之後，逐漸受到挑戰。就在漢人移民迅速拓墾、西部流番逃竄的壓力，以及背後近山地區傳統敵人泰雅族人獵頭的威脅之下，為了追尋不受侵擾的生活空間，以加禮宛社（今宜蘭縣五結鄉季新社區）為首的噶瑪蘭人，在道光 20 年（1840）左右來到了後山的加禮宛（新城鄉嘉里村），並與當時分佈在今花蓮市的強大族群撒基拉雅人毗鄰而居，⁶¹而這附近正是太魯閣族活動的區域。

隨著人口增加，加上咸豐 3 年（1853）左右武暖社（今宜蘭縣礁溪鄉光武村）一部分族人前來，併入加禮宛社，⁶²加禮宛社乃分成六個部落，即加禮宛社（今嘉里派出所與天公廟附近，亦稱「大社」）、竹仔林（嘉里一路的土地公廟東邊，到美崙溪一帶）、武暖（嘉里一街、嘉里二街附近及其北邊，亦稱「埔仔」）、七結仔（新城鄉北埔村北埔火車站到福聖宮一帶）、談仔秉（舊址不詳）與瑤歌（大社北邊，即國軍花蓮總醫院（原陸軍八〇五醫院）到北埔村新城國中以南一帶）等六社。⁶³其中，居於領導地位者為加禮宛社，而竹仔林是其對外的門戶，據他們長老的回憶，在現在土地公廟的位置曾放置人頭，可能是公廨的所在。他們致力墾荒，其他在原鄉因失業而陷入困境的族人也聞風而至，使其勢力逐漸增強。到了同治年間，已凌駕於先住的撒基拉雅與太魯閣兩族，稱雄於奇萊平原。⁶⁴

由於太魯閣族給予噶瑪蘭族及撒基拉雅族相當大的威脅，因此，兩族曾從十六股（今花蓮市「延平王廟」附近）出發，共同打擊近山地區的太魯閣族，甚至

⁶⁰ 馬淵東一，〈スナサイとカバラン族〉，收入《南方土俗》1 卷 1 號（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南方土俗學會，1931），頁 79。

⁶¹ 關於噶瑪蘭人的遷徙背景及經過，請參閱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第 3 章第 1 節及第 4 章第 1 節。另外，關於到後山之後與撒基拉雅人的關係發展，可參閱潘繼道〈花蓮舊地名探源—認識加禮宛〉，頁 82-84；潘繼道，〈花蓮舊地名探源—被遺忘的「奇萊」民族與其故事〉，頁 7。

⁶²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 21，及頁 118-119；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東京：刀江書院，1928），頁 883；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 1 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頁 406。

⁶³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 21；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附錄中偕得福與江加走夫婦的訪問。

⁶⁴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稿》，卷 3（上），〈民族〉，頁 8。

追擊到現在的秀林村（屬於秀林鄉）附近。而從加灣社（即九宛，今秀林鄉景美村）人的口傳歷史中，加禮宛的噶瑪蘭人也經常侵犯他們，因此，他們曾一度遷離，而兩族之間相互對抗的仇殺事件也不斷地發生。⁶⁵而當咸豐元年（1851）漢人進入十六股（今花蓮市國強里）開拓之後，噶瑪蘭族人爲了避免過去在蘭陽平原喪失土地的悲劇再度上演，因而經常渡過美崙溪攻擊「阿步干壠區」，造成慘重的傷亡。⁶⁶

四、南勢阿美族(Ami)

阿美族自稱爲 Pangtsah 或 Amis。⁶⁷Pangtsah 一名可能來自於馬來語的 bantsa，有人種、血統、同族、民族之意。amis 則是「北方」的意思，是與 dimur「南方」相對的用語。amis 是原先住在該族南邊的排灣族(Paiwan)與卑南族(Puyuma 或 Panapanayan)對他們的稱呼。在阿美族當中，較常用 Pangtsah，而且其通用範圍也較廣，因此，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主張用此名稱爲阿美族的族名。⁶⁸由於政府與現今學者都用「阿美」(Ami)爲其族名，因此，本文中亦沿用「阿美族」的稱呼來敘述。阿美族著名的社會結構，爲年齡階級制度與母系社會。

奇萊地區的阿美族屬於「南勢阿美」，他們是阿美族五個群⁶⁹中最北的一群，主要分佈地在今花蓮市南邊與吉安鄉境內。夏獻綸的《臺灣輿圖》中載：「鯉浪溪（即美崙溪）南者，統名曰南勢，凡七社……」，並在〈附錄番社〉中提到：「南勢七社：巾老耶、飽干（今花蓮市主權里德安一帶）、薄薄（今吉安鄉仁里村）、斗難（即荳蘭，今吉安鄉南昌村、宜昌村一帶）、七腳川（今吉安鄉太昌村、慶豐村、吉安村、福興村靠山邊一帶）、理劉（即里漏，今吉安鄉東昌村一帶）、脂寇寇（又名集集社；現附入飽干，位於今花蓮市福安一帶，即主學、主和、主安、

⁶⁵ 高琇瑩，〈歷史脈絡下的族群接觸—太魯閣人的對外關係〉，載於《花蓮縣第二屆鄉土教育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1999），頁 83-84。而森丑之助也曾提到：「慄悍的平地蕃人一加禮宛蕃及阿眉蕃，有時候看到山中有炊煙冉冉升起，便急速地循著炊煙的方向去攻擊太魯閣蕃，交戰時割下對方的首級。平地蕃有時候組隊到山中出草，襲擊耕作中的太魯閣蕃人，甚至圍攻他們的蕃社。結果，太魯閣蕃人懼怕平地蕃，視同鬼魅，小孩哭的時候，大人只要喊一聲：『加禮宛人來了！』小孩立刻怕得不敢作聲。」（楊南郡譯註，森丑之助原著，《生蕃行腳》（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429-430）更可爲前面所說的噶瑪蘭人的稱雄奇萊平原作一有力的註腳。

⁶⁶ 潘繼道，〈花蓮舊地名探源—被遺忘的「十六股」軼事〉，頁 7-8。

⁶⁷ 移川子之藏等著，《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389；黃宜衛，〈阿美族的傳統社會文化與人權現況—僅那鹿角部落的例子〉，載於《臺灣土著的傳統社會文化與人權現況》（臺北：大佳出版社，1987），頁 167。依筆者接觸經驗，當唸成 bangtsah 音比較接近。

⁶⁸ 此乃移川子之藏等著，《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第 8 章之觀點。另外，亦可參考李亦園〈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頁 141。

⁶⁹ 即南勢阿美、秀姑巒阿美、海岸阿美、臺東阿美（或稱爲卑南阿美、馬蘭阿美）、恆春阿美。

主農等里)。」⁷⁰其中，巾老耶即是撒基拉雅，而飽干是撒基拉雅族其中的一個部落。後來撒基拉雅族在「加禮宛社之役」中戰敗後，竹窩宛社改成「歸化社」，而且漸漸被附近的阿美族人同化(飽干社亦同)。

根據南勢阿美族人的傳說，提到古代奇萊平原的北部，曾居住有南勢阿美族人的祖先。有一天突然響起遠雷般的聲音，接著發生土地劇烈震動、山川潰裂。而在海水遠退時，番民跑到海灘上撿魚。到第五天正午，土地又再度震動並龜裂，且噴出熱水，又發生海嘯，番民競相逃走，結果躲避不及而遭溺斃者不計其數；而逃回番社者，又因熱水漲到男子腳踝、女子膝蓋的高度，而致悶死。當時的番民幾乎全滅，僅有 tuyaw(男)、luma(女)兄妹倖免於難，此二人後來成為南勢阿美族人的始祖。他們兩人在這重大變故發生之後，拿了四束陸稻乘坐木臼逃命。

當時奇萊平原已經完全沒入水底，兩人隨著海浪漂流若干時日，就在所攜帶的米快吃完時，漂到了 Nalomaan (今花蓮市主權里飽干部落附近)。兩人擔心晚年行動不便時生活會發生困難，雖知兄妹結為夫婦有違神明教示與祖先遺風，但又礙於無他人可成為配偶，因而不得不成婚。他們先產下一對男女雙胞胎，後又生一男一女，此二男二女各自結為夫婦；其子女長大後，又相互通婚而繁衍開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形成了一個部落，後來因為人口逐年增加而感覺生活不易，於是商議分開居住。

移居當日，天未亮時社眾就分成三團，各團按聲音之大小來分配人數，然而選擇肥沃土地者想要多獲得一些人，因此，發出低微的聲音，結果得以聚集眾多的人移居該地；當地有很多 taor (胡頹子) 樹，因此，稱為 Nataoran 社，即荳蘭社。喜歡有很多木柴的地方的一行人移往山邊，即成為七腳川社。而仍留居在 Nalomaan 的一行人，後來移居到薄薄社，並且為了製鹽，又有一部分社眾再移往里漏社。據說在 Nalomaan 建立部落時，在歸化社(今花蓮私立四維高中附近)東方曾有稱為「達固部灣」(即 Sakiraya，撒基拉雅族)的異族部落(「加禮宛社之役」後，遭清軍滅社。後來一部分族人再另建歸化社，其餘則逃至他處建立尪尪社、飽干社等)，其族原本語言與 Nalomaan 系統各社不同，但被滅社後因彼此交通往來頻繁，而被阿美族人同化。⁷¹

而在移川子之藏所蒐集的口傳歷史中，其起源地並不清楚，而且兄妹所乘坐的白，乃漂到花蓮港西北邊的 Tatevuratsan 山，後來更一度遷到南方奇密社(今瑞穗鄉奇美村)附近的 Tsirangasan 山，然後才又北上到今吉安鄉一帶。⁷²另外，在李亦園所採集到的傳說，則是兩兄妹在災難發生之後，先乘坐獨木舟避難至大

⁷⁰ 夏獻綸，《臺灣輿圖》，臺灣文獻叢刊第 4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75-77。

⁷¹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二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0)，頁 6-7。

⁷² 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所屬系統の研究》，頁 491-501。

港口（今豐濱鄉港口村）附近，洪水消退之後，兩人結為夫婦、繁衍子孫，一部分成為馬太鞍、太巴塽社（均在今光復鄉）的祖先，一部分則沿著花蓮溪北上，到今天的吉安鄉。⁷³

不管他們的祖先怎樣遷移，這些傳說主要在強調南勢阿美族人乃屬於同源。然而關於七腳川社，南勢阿美內部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上述的 Nalomaan，在阿美族語是指「老家故地」、「舊部落」，但是薄薄、荳蘭、里漏的 Nalomaan 是在荳蘭社附近（今屬於飽干社的範圍）的平地，而七腳川的 Nalomaan 所指的卻是在山地。另外，從荳蘭社的傳說中，也提到七腳川社的祖先是來到該社西方山地落腳（該山地稱為 Kuduvan）；薄薄社也提到七腳川之舊地名稱爲 Kuduvan，它屬於別的系統。⁷⁴這透露出彼此之間仍存有些許的差異性。不過，從語言、習俗來看，七腳川與薄薄、荳蘭、里漏等社並無不同，要將之視為特殊的系統，實在非常困難。

事實上，「同族」的概念乃近代國家統治之後，因為外來族群的挑戰或分類，而逐漸形成的，尤其是在日本統治的 50 年間。⁷⁵過去在國家勢力進入之前，南勢阿美各社之間存在著不同的關係，其中，荳蘭社與薄薄社不論在古老的傳說中，或在今日兩部落成員的意識與交往上，均表現出密切而不可分的關係；里漏社則自成一個單位，因為他們有外來系統的人混入裡面，使得荳蘭、薄薄社人始終對之有「非吾族類」之感（但戰爭發生時會結合成攻守同盟）；而七腳川社與荳蘭、薄薄、里漏等社常有激烈的戰爭，且七腳川社因勢力甚為強大，常仗勢欺人，因此，荳蘭等社都對之畏懼，把它當作是敵族。⁷⁶

七腳川社也常與秀姑巒阿美的馬太鞍社戰爭。丘其謙在馬太鞍社所採集的傳說中，提到與馬太鞍人衝突最多的，首推七腳川人，他們常以最壞、狡猾等字眼來形容七腳川人，由此可知他們之間結仇之深，⁷⁷而二社之間也曾一度和解過。

荷蘭人因為砂金的傳說進入後山北路一帶，並曾征討 Sakiraya 及阿美族部分族社，但是荷蘭軍隊在當時並未碰到七腳川社，可能當時的七腳川仍舊居住在地中，並未遷徙到平原上，抑或是人數較少，且未與荷蘭人正面衝突，⁷⁸以致缺

⁷³ 李亦園，〈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頁 145。

⁷⁴ 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所屬系統の研究》，頁 501。筆者與花蓮鄉土教育及考古專家王天送先生（日治時期曾陪同鹿野忠雄進行考古）於 2001 年 5 月 5 日進行田野調查時，他提到在銅門遺址（秀林鄉銅門村）一帶考古時，曾經發現阿美族的陶片，而不是太魯閣族的器物，此與七腳川社有關也說不定。

⁷⁵ 潘繼道，〈國家、族群與歷史變遷—近代臺灣後山南勢阿美「七腳川社」勢力消長之研究〉，《臺灣風物》53 卷 1 期（板橋：臺灣風物雜誌社，2003），頁 89。

⁷⁶ 李亦園，〈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頁 144-147。

⁷⁷ 劉斌雄等著，《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頁 239-253。

⁷⁸ 康培德，《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頁 48-49、63-127、214-215。

少對它的描述。隨著太魯閣族往中央山脈東側遷移之後，七腳川社感受到壓力，慢慢地遷移到山麓地帶。

由於南勢阿美各社往往把七腳川社視為敵族，加上七腳川社居住地鄰近木瓜番，並常與木瓜番接觸，其強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原本分佈在今花蓮市的撒基拉雅族人，有時也稱呼他們為 *Bakuay*(*Vaguai*，即木瓜番的稱呼)。⁷⁹而在筆者查訪撒基拉雅部落時，曾擔任花蓮市國福里里長的黃金文也曾聽其耆老說過，他們的祖先曾跟七腳川社打過仗。⁸⁰雖然七腳川社非常強悍，使荳蘭、薄薄、里漏三社畏懼，但在戰爭中這三社往往結為攻守同盟，甚至使得七腳川社抵擋不住；不過媾和修好後，彼此即又和平相處、相互通婚。⁸¹

前面提到的，木瓜番曾經跟吉安鄉、壽豐鄉一帶的阿美族人物物交換，甚至交換範圍遠達東海岸，而當秀姑巒溪口的部落與木瓜番之間有戰鬥、交惡的現象發生時，七腳川社可能扮演居中將物產、裝飾物從東海岸帶到木瓜番部落的角色。

當太魯閣族群進入後山之後，南勢阿美族人飽受來自西北與西南方面的威脅。根據南勢阿美族人的傳說，與他們最常發生戰爭，且是他們最畏懼的敵人，是外太魯閣番與木瓜番，由於出擊無常，因此，使南勢阿美各部落的戰士隨時都在戒備中，深怕稍有鬆懈即被敵人趁虛而入。⁸²

後山因為族群眾多，帶來了多元的文化色彩，但也因為複雜的族群分佈，使族群間的雜居、遷徙發生了障礙。新的族群移入時，往往引起該地區「原住」族群的對抗，彼此的溝通、結盟，甚至征戰，都必須妥善回應，或予以強力反擊，否則，勢必在生存空間的競逐過程中遭到淘汰。

而在大多數原住民族群的觀念中，祖先傳承的土地或祖靈地是不容許侵犯的，凡是侵入者，不論對象是誰，一律要予以殲滅。由於過去同族的概念較為薄弱，與自己有血緣或攻守同盟關係的族社，才可能和平共處，所以儘管同族群的族社間（例如太魯閣番與木瓜番，木瓜番與巴都蘭番，或七腳川與荳蘭、薄薄社），也可能發生出草或戰鬥的事件；而鄰近的異族，則依據不同的需要決定彼此的關係，可能是朋友，但也可能是敵人。

而「開山撫番」之前進入後山奇萊地區的漢人，在面對機動性、爆發力強的原住民族群時，更得小心回應，否則將使自己陷入危機當中，甚至喪失性命。

由於清帝國統治前期，活動範圍仍以臺灣西部為主，後山奇萊地區並未正式設治，因此，只有少數冒險家及通事從事零星的探險或番產貿易。其間，雖有集團式的漢人農民前來移墾，但在瘴癘之氣侵襲及國家統治力量尚未進入約束之

⁷⁹ 陳俊男，〈奇萊族（*Sakizaya* 人）的研究〉，頁 46。

⁸⁰ 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 250。

⁸¹ 李亦園，〈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頁 170。

⁸² 李亦園，〈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頁 170。

前，成效並不理想，甚至在原住民族群攻擊之下，完全放棄。⁸³

⁸³ 早在康熙 32 年(1693)，合賈往來沿海貿易的陳文、林侃，因為船隻遭遇颱風而漂到了奇萊，結果發現此地有生番分佈，因而陳文到部落進行交易；住了一年之後略通番語，並且瞭解海道（連橫，《臺灣通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 566-567)。這可能是清代漢人到奇萊從事番產貿易最早的記錄。而賴科在擔任雞籠通事時，常出入於番社之間，因為聽說後山有番人居住，想與之交往，因而在康熙 35 年(1696)冬天與 7 人作伴準備前往，由於沿路必須通過泰雅族群的勢力範圍，為了躲避襲擊，因此，晝伏夜行，歷經數十番社，並翻越崇山峻嶺才到達後山，此行使得均榔(即撒基拉雅)、斗難(荳蘭)、竹腳宜(七腳川)、薄薄、芝武蘭(泗波蘭，豐濱鄉港口村)、機密(瑞穗鄉奇美村)、貓丹(馬太鞍)、丹朗(太巴塢)、水輦(壽豐鄉水璉村)九社附阿里山番輪餉(連橫，《臺灣通史》，下冊，頁 567；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33；鄧孔昭，《臺灣通史辨誤(增訂本)》(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1)，頁 225-226)。此時漢人雖然進入後山，但尚未有拓墾的事蹟。到了嘉慶 17 年(1812)8 月，噶瑪蘭的漢人李享、莊找以布疋折銀 5250 大元向五社通事購買「祈來」(即奇萊)的土地開墾，其位置相當於今吉安鄉全部及壽豐鄉的一部分。李享、莊找當時所領導的佃戶不過 20 多家，他們開築水圳、興建水利，並設屏藩，且從佃戶中選出 10 戶為佃首，向李享等領耕土地，然後再招募佃農墾殖。道光 4 年(1824)，因遭到撒基拉雅人的攻擊，而放棄墾地，走避於南勢(今吉安鄉)。次年(1825)，淡水人吳全偕友蔡伯玉，自噶瑪蘭招募 2800 人來後山拓墾，李享、莊找乃分土地給他們，更從諸社購買北自木瓜溪，南至支亞干溪的土地，於是設公館、立公約，並部署其下佃眾為漳、泉、廣三部，推吳全、李享(李合吉)、廖宗國、莊找(莊有成)、吳乃信等為頭人，並分地而耕。由於吳全屢遭木瓜番的侵擾，乃興築堡壘自衛，稱為「吳全城」(在今壽豐鄉志學村東邊及平和村的吳全社區)。道光 7 年(1827)5 月，又從諸社購得北起得其黎(立霧河流域)，南至大鼻(即大笨、美崙鼻)之地，稱為「奇萊上港」，並且招募佃人繼續墾殖。當時將土地區劃為順安、興安、君威、君爺四圍，分置頭人，並推選蔡伯玉總董其事。當時太魯閣族、南勢阿美族、撒基拉雅族不斷侵擾，加上墾民入墾瘴癘之地後，發生水土不服，造成很多人生病，甚至死亡。不久，吳全罹患疾病去世，使得諸佃恐懼而不安耕作，許多人因而相率逃回噶瑪蘭，少數人則南下至馬太鞍、太巴塢、巫老僧(今瑞穗鄉富源村)等社，於是多年經營之地又告荒蕪，而李享、莊找亦不知所終(黃瑞祥，〈花蓮縣居民繁殖考〉，頁 93；駱香林，《花蓮縣志稿》，卷 3(上)，〈民族〉，頁 5-6；曾一平，〈漢人在奇萊開墾〉，頁 78-79；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8)，頁 348)。咸豐元年(1851)，臺北劍潭的豪農黃阿鳳召集十六個股東，並招募地方窮民 2200 餘人，從噶瑪蘭經由海路前來後山，在新城上陸，一部分留在得其黎溪(立霧溪)畔開拓荒埔，自己則率眾南下，在美崙山的西北邊著手拓墾，建立十六股、十八鬮、阿步干、三仙河、武援(暖)與沙崙等聚落與墾區(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臺灣)》(東京：富山房，1909)，頁 179；潘繼道，〈花蓮舊地名探源—被遺忘的「十六股」軼事〉，頁 7)。所謂的「十八鬮」是指開墾前為了公平選擇土地，先做十八個「鬮」讓大家來抽籤，以決定耕作的土地。而「阿步干」(須美基溪與美崙溪匯流處附近)，可能得名自原住民的名字。在光緒 4 年「加禮宛社之役」前，漢人不太敢到阿步干工作，因為非常危險。根據十六股耆老詹燕清的口述，以前開墾時經常與美崙溪北邊的加禮宛人(即噶瑪蘭族)相爭，造成慘重的死傷。當漢人前往割稻時，加禮宛人會渡過美崙溪來殺人，因此出門時得帶「傢伙」，否則突遇來襲將措手不及；有些人逃跑不及，就把木製的「摔桶」翻過來藏在底下，當加禮宛人掀開摔桶時，躲在底下的漢人就用鐮刀攻擊加禮宛人的腳脛，使其受創無法走路。當三、四個番人被攻擊受傷時，加禮宛人才開始退去。而所謂的「三仙」，是指墾戶當中以三個人為主，包括地理仙(即地理師)、拳頭仙(教人練拳)、赤腳仙(懂得用草藥)。他們因為訓練一批會武功的人，而敢前往開墾。當時加禮宛人會到這裡襲擊，甚至連南勢的番人也會來到這裡。而之所以稱為「武援」(今港天宮沿美崙溪一帶)，是因為這裡是耕作時重要的水源區，由於各地的番人會到此地襲殺墾眾，因此，漢人雇用撒基拉雅人協助看顧水源(進行「武裝援助」)，讓它不要被破壞，而當稻子收成時，再酬庸數百包的穀子(潘繼道，〈花蓮舊地名探源—被遺忘的「十六股」軼事〉，頁 7-8)。然而由於十六股一帶瘴氣很盛，使得黃阿鳳水土不服，並於數月後病逝，其他的頭人乃接續他未完成的事業繼續拓殖。咸豐 6 年(1856)，墾眾與噶瑪蘭族失和，因而經常發生衝突(連橫，《臺灣通史》，下冊，頁 567；駱香林，《花蓮縣志稿》，卷 3(上)，〈民族〉，頁 6)。咸豐 8 年(1858)6 月，因開墾事業日漸興盛，墾地逐漸擴大，使十六股的漢人與撒基拉雅族竹窩宛社發生糾葛；最後，漢人決定每月供給酒及布疋若干與之談和。但是到了同治 3 年(1864)，墾眾再度與竹窩宛社發生嫌隙，乃據十

當時漢人集團式移墾的人數並不算少（吳全等人率領 2800 名，黃阿鳳則是率領 2200 多人），但成就卻很有限，最後甚至盡棄墾地，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可歸納如下：（一）漢人移民大多是農民，其所熟悉的工具即為農具，不像太魯閣族等原住民族群為耕獵民族，對於番刀、矛、弓箭等戰鬥（或狩獵）武器相當熟練，而且機動性高，因此，當漢人墾眾遭遇襲擊時，應變能力較差，甚至因而喪命；（二）後山初闢時，仍多瘴癘之地，漢人墾眾入墾時，往往因水土不服而生病，甚至命喪黃泉；（三）傳統漢人是個農業民族，土地取得與農業生產成為要務，因此，往往為取得耕地而不惜冒險，結果侵犯了當地原住民族群的生活區域或獵場，而遭遇攻擊；（四）由於風俗習慣的差異及種族的優越感，容易歧視當地的原住民族群，引發衝突，而且原住民族群有時因為宗教習俗，或表現男子英勇而出草，防禦力較弱的漢人，往往成為這些獵頭民族攻擊的目標；（五）清帝國的政治力尚未進入約束，使得族群間的紛爭往往訴諸武力解決，許多墾民因得不到清政府官軍的保護而遭殺戮；（六）過去吳沙等漢人在蘭陽平原拓墾，與噶瑪蘭族人周旋，並獲得成功，乃因為當地的原住民族群構成較為單純，但後山北部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顯然比蘭陽平原來得複雜，以致開墾的難度更高。以上第（一）至（五）點，在臺灣西部或東北部地區，或許可以找到共同或類似的例子，但第（六）點應該是後山人文的特殊之處，以致漢人在拓墾的過程中嚐盡了苦頭。

綜合前面的敘述看來，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在清帝國國家體制進入支配之前，並不受國家法律的約束，都依自己的行為法則與周遭的族群展開互動；而漢人的拓墾規模並不算小，但卻無法順利的推展，奇萊地區仍是原住民族群競逐的世界。但「開山撫番」之後的光緒年間漢人大量入墾，且清帝國的政治力及軍隊進駐後山之後，使後山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受到很大的挑戰，甚至發生變遷。

六股與竹窩宛社相抗；同治 6 年(1867)，戰事失利，墾民力屈而敗走，此時墾眾過半被殺，其餘移民乃逃往璞石閣地區(今花蓮縣玉里鎮)及新城方面(吳文星、鄭瑞明編譯，〈臺東移民史〉(一)，載於《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肆卷上第 1 號(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頁 4)，拓殖事業重蹈吳全等人之覆轍。咸豐 3 年(1853)，來自噶瑪蘭的漢人漁民 30 餘戶，到花蓮溪的入海處捕魚，並在溪畔築舍而居，為了防禦南勢阿美族人的襲擊，出入皆攜帶刀子自衛(駱香林，〈花蓮縣志稿〉，卷 3(上)，〈民族〉，頁 6)。